

# 显性情节中的反战叙事和隐性进程中的人性 与理性的冲突

—— 海伦·邓莫尔《围困》中的战争创伤叙事

杨 康 刘胡敏

**【摘要】** 海伦·邓莫尔的历史小说《围困》(*The Siege*, 2001) 一发表就获得了英国柑橘文学奖, 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和批评大多关注小说对真实历史的刻画和对战争的控诉。本文通过文本细读, 将关注点放在小说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情节和叙事上, 意在揭示小说显性情节下的反战主题背后有一条关于人性与理性冲突的隐性叙事进程, 并探讨这条叙事进程如何与显性情节发生作用。作者通过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再现了战争给人们精神世界带来了循环性创伤, 本文指出只有直面人性和自我, 而不是一味追求理性, 才能打破这种循环, 治愈创伤, 真正走出战争的伤痛。

**【关键词】** 反战叙事; 人性冲突; 显性情节; 隐性进程

## 0 引 言

英国著名诗人海伦·邓莫尔不仅以诗歌闻名, 其创作的小说也颇受好评。她的历史小说《围困》一经发表, 就获得了英国柑橘文学奖, 并迅速进入英国畅销书的榜单前列。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列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叙事和伦理反思研究”(19BWW07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康, 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胡敏,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创伤文学和希腊罗马神话研究。

宁格勒围困战中，安娜及其家人在困境中求生的故事。在小说的显性情节中，作者表达了对战争的控诉，流露出对主人公安娜坚韧、冷静、勇敢等品质的赞扬。然而，小说中还存在与反战主题无甚关联的一些情节和叙述，如安娜对已逝母亲的怀念、安娜父亲与情妇的故事、苏联政府的极权统治等，这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叙事是小说的另一条隐性叙事进程。这条隐性叙事进程聚焦个人在极端环境下的脆弱和无力，刻画个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和抗争，凸显人性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展现了个人内心世界所遭受的创伤，整体上和显性情节起到互为补充、相互照应的作用。也只有把握了这条隐性进程，才能避免对小说的单一解读，全面把握《围困》这部小说的文学张力，全面理解潜藏在小说表层下的创伤叙事。

## 1 冲破城市和精神的双重“围困”：显性情节中的反战主题

作为一部具有浓厚反战色彩的历史小说，《围困》并没有把笔墨放在战场的血腥和残酷上，而是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刻画了列宁格勒围困战中普通人所面临的求生困境、伦理困境、精神危机和创伤体验，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破坏性，凸显了反战的主题。这部作品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述战前安娜一家在母亲死后的生活日常。第二部分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了战争突然爆发后安娜一家以及城内的居民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危机。第三部分叙述了在城内居民大批死亡后，物资供给不再紧张，活下来的人们有了生存的希望，而战争的阴霾似乎即将过去。本文将按照这三个部分，对显性情节所反映的反战和隐性进程表现中人性与理性冲突的相互作用进行探讨。小说的标题是“围困”，这一标题本身有着特殊的语境和丰富的含义。放在具体的战争背景下，这一标题显然指的是围困战中被封锁的列宁格勒以及城中的居民所面临的生存资源匮乏和与世隔绝的困境。在这样的物资封锁中，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各自为营，在怀疑和猜忌中一步步走向自我孤立和自我隔绝，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被切断，原本物质层面的围困也逐渐变成了精神层面的围困，战争的恐怖在其对人性的摧毁和破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显性情节下的反战主题也因此得到了强化。

1941年，德国单方面撕毁了和苏联的互不侵犯协议，对列宁格勒进行了长达900多天的封锁，城中居民面临着物资不足和信息隔绝的生存困境，小说正是设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主要讲述安娜及其一家人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想方设法获取生存资源的。封锁初期，安娜的父亲自愿参军，安娜则在父亲好友玛丽安的帮助下，照顾尚未成年的弟弟。有了玛丽安带来的各种物资和钱财，三人能够勉强生存。然而随着战事加剧，列宁格勒被进一步封锁，城中物资供应更加紧张，安娜的父亲也因意外受伤被遣返回家，安娜不得不采取各种非常手段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如冒着被空袭轰炸的危险到城外挖菜、在空袭烧毁的房子里寻找物资以及把父亲珍贵的藏书作为燃料取暖等。在没有尽头的封锁中，生存变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和意义，人们在物质意义上的围困中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在求生动力的驱使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逐渐崩塌，城市的“围困”变成了精神上的“围困”。当物资紧缺到一定程度时，城内的生存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零和博弈，猜忌和怀疑也随之而来，不管是排队领取物资时小心翼翼生怕有人抢走自己的物资卡，还是走在回家路上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搭话询问，这些警惕旁人的行为说明人们在敌军封锁期间形成了各自围困的精神孤岛，敌人已经不仅仅是纳粹的士兵和军队，周围互相抢夺生存资源的普通人也成了潜在的敌人。曾经的朋友、邻居甚至是亲人，似乎都在这场生存的零和博弈中成了自己的对手，生存的压力将人们割裂开来。然而人们内心深处又害怕这种分裂，因为他们生存下去的最大信心，恰恰来自他们对人与人之间联结的依赖：他们始终坚信，城外的政府和人民没有抛弃城内坚守着的人们，这一点也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最后一丝希望。可是当城内人互相警惕和自我隔绝的时候，这种信仰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城内的人们也因此生存在一种精神围困的矛盾当中，矛盾的一端是对生存的渴望和人性的抛弃，另一端却是对他

人的依赖和共存的信念，物质上的封锁逐渐转变成精神世界的围困。作者对城市被“围困”以及居民精神被“围困”的描写也构成了小说的显性情节，这一条显性情节揭示了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反战情绪。

在这种精神围困中，城中的人们也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艰难的伦理选择。安娜看到邻居的孩子营养不良，纠结是否应将自己的物资补给分给他们。如果分了，家人的营养得不到保障，弟弟本就瘦弱，很可能因营养不良而生病；但如果不分，邻居的孩子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死去，而且本就孱弱的邻居也很有可能支撑不住随孩子而去。安娜的父亲也同样面临着生死的抉择，如果他活着，一副病体的他只是这个家庭生存的负担，但如果他死了，无疑会给失去母亲的安娜和卡雅带来又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守城的指挥官也不得不在两难中决定城内物资补给的份额，如果他选择削减本就低于生存线的补给份额，就相当于通过居民的死亡来缓解物资的紧张。但如果他不减少份额，本就不足的物资也难以维持，结果还是会有很多居民因此活活饿死，居民死去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作为一个守城的指挥官，他有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尚有良知的普通人，他却要受到杀人所带来的良心拷问。这种进退维谷的艰难选择，是小说中几乎人人都要面对的困境。正如小说最后提到的，“人人不提，但人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的生存是以其他人的死亡为代价的”，（170）<sup>①</sup>当生存变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时候，这样的选择便难以避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割裂，这种个人即为孤岛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围困”二字的最好注脚，是对残酷的战争最有力的控诉和谴责，反战的主题也在对这种精神围困的刻画中得以彰显。

但是小说没有简单停留在对这种双重围困的刻画，更着力展示了人们最终冲破围困的努力：安娜和其他女工共同劳作，相互扶持，彼此信赖；安德鲁伊和安娜在生存困境的考验之下反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即使是陷入生存“零和博弈”的城中居民，也始终有着自

---

<sup>①</sup> 文中只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引自 *The Siege*，引文均为本文作者自译。

己不可逾越的底线，即使他们对生有着强烈的渴望，也不会为了生存而选择投降，反而是竭尽所能地反抗。他们着力修建战壕，为可能的强行攻城做迎战的准备，更在城内埋下各种陷阱和地雷，这样即使列宁格勒被占领，也能在最后关头给予敌人一次“自杀式”的打击。如果说城市和精神的双重围困源自个人对生存的追求和生存资源困乏的矛盾，那能让人们冲破这种围困的不仅有人们内心深处对人与人之间联结的信任和重建，更有人们心中视死如归的抵抗和牺牲精神，这种内在的坚守和信仰让城中的居民在绝望的处境中也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因而在小说的显性情节中，战争的残酷无情反而凸显了人们的坚韧与顽强。小说不仅仅是对战争进行控诉，更着力于展现人们内心世界的挣扎与抗争。外在世界的无情和内在世界的坚守形成了一种对比，在凸显战争残酷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人性光辉的讴歌与赞美，小说的反战思想因而有了更深的层次。

## 2 理性背后的创伤：隐性进程中的创伤叙事

然而，仅仅用“冲破围困”的反战思想来解读《围困》这部小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这部作品近乎冷酷的冷静笔调可以看作作者为了客观地反映战争而有意为之，那么其他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无关情节则很难用这一理由加以解读。不管是小说中字里行间对地理环境差异的强调，还是对安娜追梦失败和无奈的叙述，抑或是对父亲郁郁不得志的刻画，这些似乎都和反战的主题没有很强的关联性。这说明，在反战主题之下，小说还存在一股与之并行甚至先行于这一主题的叙事动力，只有找出这种动力，才能把这些看似无关的情节统一在一起，更为全面地把握小说的叙事动力，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

针对这种显性情节下隐藏的叙事动力，申丹教授提出了“隐性进程”的概念。她指出，“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个是情节运动，也就是批评家们迄今所关注的对象；另一个则隐蔽在情节发展后面，与情节进程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

义上与情节发展上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申丹，2013），而这种隐藏在显性情节背后的叙事运动就是叙事的隐性进程。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在反战主题情节发展的背后的确存在一股先于这一主题的隐性叙事进程：从父亲与其情妇被时代抛弃的痛苦和无奈，到安娜母亲死于产后并发症，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种种难以预料、不可控制的事情，他们的命运似乎被一种神秘而不可控的力量所控制，而战争则是这一系列随机事件中最令人痛苦的。在这条隐性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战争本身，而是在种种极端的环境和际遇之中人们内心世界所发生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背后的精神创伤。在小说的显性情节中，读者能看到人物内心的坚守，在隐性进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却经历了人性和理性的冲突，遭受了失语的创伤。在战争的影响下，人们被迫选择了一种近乎冷漠的理性，人的本性受到了压抑，这种压抑和冲突带来的创伤构成了隐性进程中创伤叙事的主要动力。

正如聂珍钊所说，理性是“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正确认知和价值判断”（聂珍钊，2014：252），理性的选择看似是人自主做出的抉择，但抉择的理性与否在根本上却依赖于“特定环境”，而人性却是“人作为人而非兽存在的本质属性”（聂珍钊，2014：271），是人本身的一种属性。也正是因为理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制约，而人性却是人自身的一种特质，理性也必然会在某种特定情形中和人性及人的本能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恰恰就是安娜和安娜母亲理性显得“冷漠”的原因：她们极力克制自己心中痛苦、恐惧、不满等各种消极的情绪，压抑自己近乎本能的冲动，时刻保持客观和冷静，并根据她们所处的情形做出她们认为正确的选择。这种压抑和克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精神的麻木与失语，带来了潜藏在理性下的创伤。

从隐性进程的角度来看，“围困”这一标题就已经暗示了造成失语性创伤的原因。这里的“围困”并非仅仅指战争背景下个人所面临的精神孤岛的困境，更是指个人在各种极端环境和非常境遇下的孤独无助和脆弱无力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周围环境的压力似乎形成了一种包围和吞噬的暗流，将个人裹挟在不可控制的困境之中。

“围困”因而营造了一种对比的关系：个人处于一种被孤立包围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是渺小和无力的，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而能够生存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的人也往往有一种近乎冷漠的理性，然而这种理性是以自我沉默和自我失语的精神创伤为代价的，这一点在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得到了印证。

小说的开头主要讲述了战前安娜一家的生活。从反战主题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似乎可有可无。但如果从隐性进程的角度进行考量，小说开头的内容实际上已经为全书奠定了冷峻、客观的基调，并揭示了贯穿小说始终的创伤叙事动力。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不同，安娜的母亲首先是一名冷静沉着、思维缜密的学者，其次才是一位负责、理智的母亲。在工作中，她的严谨认真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对客观事实的强调和对实证方法的重视也让她在医学科研事业如鱼得水。这份理性不仅仅停留在工作中，更延伸到了她的日常生活之中。即使是在照顾自己的女儿时，她也时常用一种带着疏离的温情来应对女儿的诉求，用一种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态度来处理和他人的亲密关系。甚至到了她生产大出血、生死攸关之际，她也能十分冷静地按铃呼叫护士，用冷静客观的语调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免吓到护士”（8）。可以看到，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抑制了安娜母亲正常的情绪表达，而这种理性也并非全然出自她个人的抉择，她的工作、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包括丈夫潜在的不忠行为，都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并非天生理性，而是“不得不”用理性去应对生活的一切。

然而这种理性的背后实际是创伤应激障碍的一个重要症状。赫尔曼提到，“有时逃脱不掉的危险处境可能引发的不只是恐怖和愤怒，吊诡的是，也可能出现超然的冷静状态，此时恐怖、愤怒和痛苦都消散不见了，事件还在不断进入意识中，但宛如已和它正常的意义脱钩了”（Herman, 1992; 31）。这说明，小说许多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理性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被迫选择，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麻木和精神创伤的体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真实的情感表达被麻木的理性压抑，个人也因而陷入一种精神失语的困境之中。在这种麻木

和失语中，战争与死亡似乎变成了日常，人们也似乎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一切都显得“正常”起来（31）。

这种“被迫理性”和创伤应激障碍所带来的麻木在安娜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消沉深深影响了安娜，使她被迫成熟，原本极度依赖母亲的她现在只能在睡梦中重回母亲的臂弯。当她醒来，她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和父亲的责任。有着绘画天赋的她似乎也失去了对生活中美的敏感，对现在的她来说鲜花的价值远远不及院子里种的土豆，因为这些蔬菜才能提供弟弟成长所必需的“营养和维生素”（2）。即使当父亲为了鼓励她，安排她去给曾经的名演员画肖像，她也仅仅沉浸在短暂的喜悦中。即使当她用一个艺术家特有的细腻和感性去照顾托儿所的孩子时，也会被批评过于“感情用事”（16）。丝毫不在意孩子的感受、只懂得套用教育理论的院长对她颐指气使。适合照顾孩子的安娜只能做一名临时工，适应政治环境的院长却能如鱼得水。可以说，安娜的生活从来没有掌握在她自己手中，她的一切都是特定环境下无奈的选择，家庭的不幸和社会的腐败完全压抑了她所谓的个人意志，而她能够生存下来也恰恰因为她继承了母亲的性格，由感性被迫走向了近乎冷漠的理性。即使她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对浪漫和温情的渴望，现实的重担却早已经剥夺了她选择和表达的权利，她也因此和母亲一样被迫陷入了精神麻木和精神失语的创伤之中。

从反战的显性情节来看，小说开头部分人物的相关经历似乎并不能体现小说的主旨思想，但实际上这一部分已经为全书奠定了一个压抑、肃穆的基调和氛围，这与后面对战争期间城中居民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痛苦生活实际上也有着共通之处，这一共通之处在隐性叙事进程下则更加明显。从创伤叙事的角度来看，安娜与其母亲在人性和理性的冲突中走向冷漠理性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精神世界被隔绝、被失语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她们表达自我情感诉求的本性，她们的理性实际上是创伤应激障碍的体现。

在隐性叙事动力之下的创伤叙事中，小说开头也并非与后文割裂，而是与其一脉相承，共同展示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受

环境影响所发生的改变和被迫做出的抉择、这种抉择中被压抑的人性和情感以及这种压抑所带来的精神创伤。正如作者在采访中所说，小说并非为了“回顾历史”，而是试图展现人们在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内在世界”（McCrum, 2021），揭示战争背景下个人在人性和理性之间的痛苦抉择。因此，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反战主题下的显性情节似乎还未完全运作，小说的隐性叙事动力就已经先行于这一显性情节开始发挥作用，暗示了小说另一个潜藏的主题：残酷的战争中人性和理性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所带来的失语性创伤。

### 3 理性和人性的冲突：小说的双重叙事进程

小说主体部分的笔墨主要放在战事突然爆发后城中被围困居民的求生经历和困境。结合前文的论述不难发现，这一部分的隐性进程和显性情节实际上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走向。显性情节中，人们在战争所带来的困境中艰难求生，最终冲破了城市和精神的双重围困，小说从战争所带来的绝望走向了重生的希望。但在隐性进程中，生存却是以被迫选择理性及其所带来失语的精神创伤为代价的。人们冲破围困的时刻，恰恰是这种精神麻木和精神失语最为严重的时候。小说在对未来的希望中结尾，希望之下却隐藏着战争所带来的难于言说的精神创伤。

小说开头的部分为展开营造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氛围，虽然安娜会用“我们和德国之间存在协议”（21）这件事来安慰自己，相信战争不会爆发，但是许多人都隐隐地感到了战争的逼近，并用诸如“情势”“近况”（21）等语焉不详的措辞来隐藏自己对战事的恐惧，而战争也的确在民众惶惶不安的情绪中突然爆发了。从显性情节来看，这是为了用民众内心没有言说的恐惧来渲染战事的恐怖和残酷，而从隐性进程来看，这种言语上的逃避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失语，是过去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的体现，而这种失语也在安娜父亲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安娜父亲是一位十分有才

华的作家，他曾经也大受欢迎，但现在他所创作的故事因为不够“社会主义”、不够“积极向上”而失去了发表的机会，就连作家协会的成员也直接指出，时代已经变了，“作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3）。然而安娜的父亲不肯屈从于大环境，固执地遵循之前创作的准则，写出来的作品既没有得到同僚的认可，也没有受到大众的欢迎，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直言不喜欢他的故事，他也只能将自己的作品束之高阁，不再试图去发表自己的作品。而细读他的故事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过去战争经历的隐喻式再现，“冬天将军和饥饿将军的争辩”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并说明战争不仅摧残人的肉体，更能在对肉体的折磨中逐渐摧毁人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对战争的恐惧让他在列宁格勒封锁初期忍不住对着图库佐夫的雕像祈祷，祈求像他这样的英雄能够再度出现，“拯救人们于水火之中”（29）。社会大环境对这种故事的否定实际上说明不仅仅个人会主动选择逃避和失语来应对创伤，整个社会意识其实都在逃避战争历史、主动失语。民众告诉自己不该沉溺于过去，而是应该着眼当下，全身心地投入社会的建设，人们的这种“理性”也是一种对自身表达和精神诉求的压抑。然而，不管是过去战争经历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还是这种选择性“失语”所带来的创伤，在战争可能爆发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被重新唤醒，人们心中恐惧的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战争，更是过去战争历史留下的伤痛与折磨。对创伤的逃避、对创伤重现的恐惧以及人性和理性冲突所带来的精神性失语，构成了隐性进程中重要的创伤叙事动力。

在围困战的初期，安娜及许多居民被强制征募去修建防御工事，他们没有像样的工具，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孩童”（40）。卡蒂亚也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直接丧命于战争炮火之下的人物之一。在战争爆发前，她本是学校的优等生、“温室里的花朵”，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而当战争爆发，她被送来修建工事，天真的她似乎意识到了战争的可怕，但她的心态却仍旧停留在从前的生活。当许多人尝试去适应围困之下的生活，对这种劳作“习以为常”的时候，卡蒂亚却说出了“有人会因为我

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读博的理想，甚至因为我定做的漂亮裙子杀了我”（32）。这样看似荒唐不已的话也反映出她害怕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被战争剥夺的生活和逝去的过往。最后她被空袭中倒塌的房屋砸中，当场丧命。从反战的主题来看，她的死亡说明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战争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对人的精神造成极大的摧残。而从隐性进程来看，卡蒂亚的死亡并非全然是一个悲剧，她对过去的沉溺也可以看作她对自我情感最直接、最本能的追求和表达。从这一角度来看，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强迫自己保持冷静理性的卡蒂亚反而做到了精神上的某种自由。尽管这种自由以逃避甚至死亡为代价，但她的死亡意味着她在精神世界中得到了发声的权利和自由，她不像其他人一样强迫自己适应战争所带来的剧变，更从未压抑自己真实的情感诉求和表达。她的死亡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选择，这一点也和卡蒂亚临死前露出“天真的微笑”形成了呼应（48）。对卡蒂亚来说，要生存意味着选择压抑自我情感的理性和精神失语的创伤，死亡反而是精神和身体的真正自由。

而恪守理性的伊芙根尼亚则和脆弱的卡蒂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其他人不同，伊芙似乎完全不需要适应的过程就能应对战争带来的困境。面对指挥官的呵斥和刁难，她不卑不亢；在挖壕沟的时候，她卖力地工作；当休息的时候，她也不会去操心战争，而是抓紧休息的时间。似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她都会努力适应，泰然处之。甚至当人们因担心空袭而骚动时，也是她站出来宽慰所有人“只要有好的心态，就能应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空袭”（148）。正是她的这份从容和镇定让人们短暂地平息了下来，也正是这份冷静和镇定、这种主动适应环境的心态和能力，增加了伊芙生存的概率。从显性情节来看，伊芙身上所体现的理性是人们冲破双重围困必需的选择。但从隐形进程来看，伊芙的这种理性是以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恐惧、不安和无助为前提，强行让自己适应环境的抉择。她越显得理性和冷静，内心的情感遭受到的压抑和克制就越强，失语性精神创伤和创伤应激障碍所带来的精神麻木也就越来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坚强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伊芙会在安

娜面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痛快地哭一场”，然后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精神的麻木和失语只是一种对创伤经历的逃避，并不能真正治愈创伤，因而在合适的契机之下，这种被压抑的情感就会自然而然地爆发。与安娜和安娜母亲一样，在选择理性的同时，伊芙也经历了失语性的精神创伤。

随着战事推进，围困战进入胶着阶段，德国军队通过交通封锁和空袭轰炸的方式试图彻底摧毁列宁格勒。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守城指挥官在处理补给分配份额的问题时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削减份额实际上是以支撑不下去的部分人的生命换取另一部分人生存的希望，相当于变相杀人；另一方面，增加份额则意味着如果封锁没有被打破，全城的人都会死掉，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在反战的显性情节中，这一伦理两难显然是战争所导致的结果。而从隐性进程来看，这一抉择本身反映了作者对人性和理性冲突的思考，这一点在指挥官处事的方法和态度中更为明显。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无论指挥官做出什么决定都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论是城中人们大批死亡，还是周围同事对他的指责，抑或战争结束后政府可能对他进行的审判，都是他将来可能面对的问题。然而当他下令削减补给份额时，他却清楚地明白他“不得不”这么做（50），他的选择从来不是源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种种外在因素决定的结果。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明白自己所处的被动位置，他才会始终强调“数据”的重要，不管是各种物资的数量，还是人员的伤亡，在他的眼中都只是用以决策参考的信息而已。在显性情节中，指挥官的进退两难是战争直接导致的。在隐性进程中，这样抉择却体现了理性和人性的碰撞，选择理性而压抑人性的指挥官在同僚眼中显得“没有人的情感”（151），但实际上一切都是不得已为之，人性的本能让他被迫做出杀人的抉择时心怀愧疚和不安，而对环境的认知和判断却让他不得不放下这种情绪，做出理性的抉择。活生生的人也在这种人性和理性的冲突中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字，本该有着自主意识和情感的人在环境的压力和近乎冷漠的实事求是中逐渐异化。指挥官也强忍内心的挣扎，在其他人的面前始终保持客观和冷静，从未

在其他人的面前将自己真实的情感宣之于口。在这种精神压抑之下，他也同样经历了失语性的精神创伤，战争也正是通过这种伦理困境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折磨和苦痛。

到了围困战的后期，这种人性和理性的交锋也更加明显和残酷。当父亲因为伤痛和营养不良死去后，碍于人力紧张和极度严寒不便出门的天气，他的尸体不能火化。与沉湎于伤痛的玛丽安不同，安娜在面对父亲的死亡时，第一时间出现的却并非伤心和不舍，而是她埋藏在心底近乎算计的考量：幸亏父亲死在月初统计生存人口之后，这样安娜家还可以多领一个人的补给份额来保证她弟弟的营养。这也是为什么当安德鲁伊问安娜自己死去后，安娜是否会像玛丽安陪着她父亲那样陪着自己，安娜的第一反应是否定的。在安娜看来，人死之后只是一团没有意义的“冻肉”（159）罢了，生者更应该关注当下的事情。这样近乎冷漠的理性继承自安娜的母亲，但是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塑造。从显性情节来看，这是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生存的渴望压倒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系。但从隐性进程来看，恰恰是这份冷漠的理性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让安娜能够在困境下幸存，也是这份理性让她更加痛苦。不管是她在睡梦中对逝去母亲的追忆，还是她将自己的补给分给邻居，抑或是她想方设法照顾好尚不懂事的弟弟，都说明安娜在秉承绝对理性的同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她本性中善的那一部分，而她所谓的理性也是以抑制自己真实情感为前提的。因此随着封锁的延长，人性和理性的冲突会始终存在，而为了生存走向冷漠理性所带来的精神失语性的创伤也会一直存在。

小说结尾部分是围困战的后期，这一部分反战思想表达的力度有所减弱，并和隐性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在列宁格勒封锁中，尽管有大批人死去，幸存下来的人心中却有了生的希望。尽管封锁并没有解除，但是现有的物资补给已经能保证城中的幸存者起码不会死于饥饿。只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的生存是以其他人的死亡为代价的。然而结尾的部分对这一点并没有过多强调，而是似乎在尽力渲染一种充满希望的氛围：安娜及其一家在劫后余生的释然

中散步，安娜的弟弟也找到了玩伴，伊芙干劲十足地在小园子里松土种菜，就连曾经醉心政治斗争的邻居也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安娜改变了看法。战争虽然没有过去，但人们已经熬过了最难的那一个寒冬，所有人带着希望努力地生活着。从这一点看，小说显性情节中的反战思想完成了从绝望始、以希望终的过程。

然而，从隐性进程来看，重要的不是人们重拾希望应对困境，而是幸存者本身对待困境采取的态度。从这一点来看，战争虽然很快就会结束，人们所经历的精神创伤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在小说结尾部分，有一个场景颇值得读者关注与思考：一群男人走过伊芙的院子，看见她在卖力地松土和播种，并被她身上所流露的生命力和韧性所吸引，不禁看呆了。他们觉得，像这样的女人，“看起来似乎能够永远这样劳作下去”（175）。尽管这一段描写只是一带而过，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实际上有重要的特殊含义。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作者在结尾部分重点描述的幸存者都是在封锁战中努力求生、保持理性和从不放弃的人，而那些沉湎于过去、不愿意做出改变的人，比如卡蒂亚、玛丽安和安娜的父亲，都因不能应环境的变化做出理性的选择而死去。这也说明，这种生存的希望并没有冲淡战争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生存下来的人已经习惯用这种近乎冷漠的理性去应对普通的生活，被压抑的情感和精神麻木的状态实际上是创伤应激障碍的持续，这种精神失语性的创伤也会伴随这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

小说结尾处所展现的希望背后，更是隐藏着创伤伤痛再度复发的因子，这一点在小说最后一句话的隐性叙事进程中得到了印证：当有人看见安娜、安娜恋人和安娜弟弟在一起散步时，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三口，但“他们不是，当然不是”（176）。从显性情节来看，这句话显得稍显突兀。但从隐性进程来看，这句话别有深意。这三个人能在一起生活只是环境和一系列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是获取生存资源和维持生存所做出的理性抉择，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他们“当然不是”一家三口。这一点在围困系列的第二本小说《背叛》也得到了印证：

在冷战时期，安娜一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猜忌、试探和背叛不仅让他们身陷危险之中，也让他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和联系受到了挑战和动摇，他们很有可能因为充满斗争的政治环境“不再是”一家人，人性、理性、真实和谎言的碰撞也预示着失语性创伤的重现。因此，《围困》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非但不突兀，反而延续了全文的隐性进程，成为一条隐性的叙事线索，将这股叙事动力引向了它的续作，人性和理性也将陷入新的矛盾和斗争之中。把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创伤叙事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循环的过程之中：潜藏—唤醒—复现—潜藏，创伤也远远没有结束，下一个新的循环也即将到来。

#### 4 结 语

与传统的战争创伤叙事不同，《围困》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战场的血腥和暴力，也没有试图再现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更加关注战争背景下个人内心世界所经历的苦痛与挣扎，小说看似平淡的叙事背后恰恰是对个人精神世界变化的真实再现。《围困》中的战争创伤叙事通过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中展现了丰富的文学张力，两条叙事进程也呈现出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关系。显性情节中，战争的残酷突出了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而人们最后也冲破了城市和精神的双重围困，经历了一个从绝望走向希望的过程。而在隐性进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所遭遇的打击和创伤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战争让人们被迫面对人性和理性的冲突，这种冲突所带来的创伤可能随着战争的结束潜藏起来，却又会在新的战争到来之时被重新唤醒，陷入一个新的循环之中，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之间的呼应也印证了这种战争创伤的循环，《围困》的战争创伤叙事也在这种循环中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正如刘胡敏（2020）所说，“战争的创伤不是经历过战争和士兵的‘专利’”，在战争创伤的循环和复现中，即使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普通人同样会在创伤经历的“移植”中经历创伤的苦痛。只有直面创伤，直面内心，而不是一味地选择“理性”，才能

打破这种循环，真正地治愈创伤，走出战争的伤痛。

## 参考文献

- [1] HELEN DUNMORE. London: Penguin, 2001.
- [2]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 [3] ROBERT MCCRUM. “The Siege is a novel for now”—— Helen Dunmore talks about fact, fic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in the historic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1/jun/10/fiction>. [2021-02-28].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5] 刘胡敏. 论帕特·巴克战争小说中的创伤书写. 当代外国文学, 2020 ( 2 ): 48-54.
- [6] 申丹. 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 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 外国文学研究, 2013 ( 5 ): 47-53.